

FAZHAN

ZHANLUE YU ZENGZHANG DE YUANQUAN

发展战略与增长的源泉

——中国经验的研究

ZHONGGUO JINGYAN DE YANJIU

刘培林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发展战略与增长的源泉

——中国经验的研究

刘培林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世元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李长建

发展战略与增长的源泉

——中国经验的研究

刘培林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密兴印刷厂印装

880×1230 32 开 7.375 印张 170000 字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7-5058-3547-5/F·2860 定价：13.8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展战略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验的研究/刘培林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5
ISBN 7-5058-3547-5

I. 发… II. 刘… III. 地区经济—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2795 号

自生能力问题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代 序)

林毅夫

培林 1999 年 9 月考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三年时间里，他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圆满完成了规定的学业，协助我对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如期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曾经多次和他就论文的选题、框架、方法以及基本观点进行讨论，我对他最终完成的论文感到比较满意。论文在答辩时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最近，培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整理出《发展战略与增长的源泉》的专著，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天下所有的老师一样，我为自己的学生的每一个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我也衷心地希望培林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岗位上，再接再厉，在那里众多资深专家的指导下，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

培林希望我为这本书撰序，以我对全书

内容的了解，我愿意向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西部开发等问题的人们，特别是这些方面问题的专业研究人员推荐这本书。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用中国各省（区）、市的发展经验，来检验我归纳的关于发展战略对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影响的两个理论假说。全书的线索是，通过引入适当的假定改进现有的经济增长分解核算方法，并运用改进后的方法将中国 29 个省（区）、市的总量和劳均 GDP 增长分解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贡献，之后分别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的贡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初始条件以及发展战略特征等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经济增长的收敛回归。计量检验得到的结果支持我归纳的两个假说，即：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之下，能够使得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这意味着，对于我国发展相对滞后的省区而言，顺应比较优势的要求积极转变发展战略是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个结论对于加快西部地区开发、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引申开来，对于我国这样人均收入低、技术水平落后的国家而言，同样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才能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在选择经济增长收敛回归的初始条件变量时，并不是照搬现有文献的做法，以初始的劳均 GDP 同时作为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两者的初始条件变量，而是巧妙地运用数据包络的非参数分析方法，

将初始劳均 GDP 的差距分解为初始劳均资本量和初始技术水平的差距两种效应，并以两者分别作为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两者的初始条件变量。得到的结果表明，这样的尝试较之现有文献的做法更加合理。另外，据我所知，本书中估算的分省（区）、市分年度的资本存量数据，所依据的方法也比已有的相关研究更加合理，因而其估算结果也就更加可靠。

但是也应该指出，这本书的政策含义挖掘得不够充分。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就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谈谈看法。

我一向认为，中国在未来 20 到 30 年时间里仍然具备高速增长经济的潜力。这潜力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是两方面的后发优势，即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和中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其次是中国的高储蓄率。第三是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潜力。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决定于以下三因素：第一，各种生产要素的增长，尤其是资本的积累。第二，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的升级。第三，技术进步。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因为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一个经济拥有的自然资源的量可以看做是给定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力增长差别则不大，差异较大的是资本积累速度。而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则受到技术进步速度的制约。如果技术不进步，那么资本积累过程最终将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积

累意愿就会下降。同样，一个经济中如果没有技术升级，也就不会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向其他经济体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自己的技术进步。自己投资进行技术开发研究的方式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相当大比例的科研投资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而且即使是取得成果的研发活动，其最终得到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开发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经济体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只能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进步速度慢；而同我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在技术进步的成本上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即使是买专利的方式，许多研究证明，其成本也只是原来开发成本的1/3左右；而且购买的技术一定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

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最近也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这些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奇迹，他们依靠的就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中国从 1978 年底改革开放时，才开始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道路。1978 年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日本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也具有近 50 年的快速增长潜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情况差别比较大，而且各个地区的技术水平差距也比较大。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凭借和东部地区的技术差距，也可以获得快速的增长，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

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 GDP 的 40% 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日本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因而，中国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的潜力大。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在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如果说从改革开放开始算起中国至少可以有 50 年快速增长潜力的话，那么，从 1978 年底到现在才利用了其中 20 多年的增长潜力。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 30 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但是，经济增长的潜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

实，要充分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并让人民均享增长带来的利益，必须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根据长期以来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总结、归纳和研究，我要大声呼吁，当务之急是解决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

何谓自生能力？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获得市场上投资者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能力”。显然，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当中，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与其所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有关，一个企业只有选择进入这个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业区段中，它所生产的产品或所提供的服务才能跟国外的同类产品和服务竞争，只有这样的企业才可以在不借助政府保护的条件下，自己生存和发展。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有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才会有人投资设立，并被继续经营下去。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设立和继续经营就只能靠外力支持，主要是政府给予的政策性补贴、保护。正因为如此，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发展出来的现代经济理论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不言自明的暗含前提。在此前提下，一个企业实现的利润水平高低，取决于管理水平。

但是，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来研究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我已经详细论述过，不论是前苏联 1929

年或是我国在 1952 年开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都是为了在资金稀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不具有自生能力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而形成的“次优”的制度安排。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传统体制的许多改革，确实如批评者所讲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深入到传统体制形成的逻辑出发点——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仍然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即使有正常的管理水平，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无法获得市场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根本事实仍然没有改变。

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加诸于国有企业身上的一个政策性负担。除了这个政策性负担之外，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在改革以来也凸现出来，构成了企业的另外一个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问题不解决，所有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都不会有效，即使私有化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大型企业必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两权分离情况下必然会有激励不兼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有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政策性亏损的责任在于政府，政府就必须给予有政策性负担的企业以政策性优惠和补贴。可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之下，政府难于分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的责任，企业就会把任何亏损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而政府既然无法区别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就只好把所有亏损的责任都背负起来，从而形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企业预算约束无法硬化的情况之下，任

何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的公司治理或是产权结构的改革，都是对改革前剥夺企业人、财、物、产、供、销自主权的“次优”制度安排的背离。从国家作为所有者的角度来说，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而不会更好。只要存在政策性负担，而国家又不能让企业破产，即使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家对企业的亏损还是负有责任，而且私有化以后，企业向国家要优惠、要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国家要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就会更大。世界银行对苏联、东欧原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情况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上述推断。

我国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也在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这是因为，推行“拨改贷”政策以后，给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的手段从无息的财政拨款改为低息的银行贷款。只要国有企业还有政策性负担，而政府又只能靠银行的低息贷款给它补贴，所以，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落实。

我国股票市场的问题也根源于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国有企业上市之前虽然经过改组，剥离了冗员和养老等社会性负担，但资金密集度太高所造成的自生能力问题并没有解决。既然一个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能获得市场上投资者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是先天存在的问题，那么，设立公司董、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的改革也就不能改变这个先天的事实。而且，既然无法从经营中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利润率，投

资者也就不能从长期持有股票中获得满意回报，散户就只能靠短期股票价格涨跌的投机来赚钱。引进机构投资者以后，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事实，机构投资者同样也只能靠短期股票价格的涨跌而获利。所不同的是，机构投资者可动员的资金多，不会像散户那样只能被动地靠价格涨跌来投机，在监管不严的地方，机构投资者可以主动坐庄，通过操纵股票价格来获利，从而使股市的问题更为严重。

同样道理，在国有企业的生存靠银行低息贷款和市场垄断等政策性补贴和优惠来保证的情况下，要给民营经济在资金融通和市场准入上公平待遇的政策也就难以真正到位。

贪污腐败的情形也根源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为了补贴、保护国有企业，政府必须对价格、市场准入进行很多干预，这些干预就给政府官员许多利用手中权力来寻租的机会，贪污腐败的情形也就会屡禁不绝。

在国有企业必须靠政府政策性优惠和补贴来生存，或是可以不断向政府要政策性优惠和补贴的情况下，政企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政企不分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政府的责任，事实上，企业更具有维持政企不分局面的冲动，这是因为只有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才能不断向政府要补贴、要优惠；而在政府必须不断给企业优惠、补贴时，政府也不可能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和决策。

如前所述，只要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和改革后所凸现的社会性负担问题不解决，国家就负有向国有企

业提供补贴和优惠政策的责任。而且，目前国有企业还雇佣城市里近 50% 的劳动力，支配全国近 60% 的固定资产，国家也不可能让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如果不先提高国有企业自生能力、消除国有企业社会性负担，现在我国在存量改革上的各种问题依然会存在。

上述问题看起来很难，其实只要认识到自生能力问题这个根源所在，也就不难对症下药。

关于各种社会性负担问题的解决思路比较明确，关键是筹集这方面的资金。至于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则可以分几种情况处理：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是国防安全上绝对不可或缺的，这个企业就只能由国家财政包起来，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产品不是国防安全上非常敏感的，而这个国有企业的产品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则可以采取用市场换资金的方式和资金比较丰富的外国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市，这样，资金成本降低了，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也就克服了。另外，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产品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提高其自生能力的办法就只能是利用国有企业在工程、设计上的人力资本优势，转产符合我国比较优势而又有很大国内市场的产品。

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剥离、自生能力提高以后，政府不再负有给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优惠和政策性补贴的责任，银行才有可能商业化、利率才能真正市场化。

企业有自生能力，只要正常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正常预期利润率，股民和机构投资者才会真正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才会长期持有股票，投机和庄家操纵的问题才能根除。在没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责任在于企业自己，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才有意义。最后，如果政府不再负有给予某类企业各种优惠和补贴的责任，政府就不需要干预市场的运作，这样才会有好的市场经济，给民营企业公平待遇的政策才会实现。

我国存量改革绕不过去的深层次问题是国有企业自生能力问题。但是自生能力问题所以出现，是因为政府想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靠国内自己的力量去优先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如果这种战略思想不转变，国有企业改革就不可能彻底；而且，还可能新创造出—批不具自生能力的国有或非国有企业。所以，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发展战略思想的转变，只有采取按我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国有企业改革才能最终完成，我国也才会有透明的、没有寻租、没有腐败、没有政府不当干预、没有扭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是培林这本专著的根本的政策含义。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基本理论依据	(4)
一、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的微观基础：自生能力的概念	(4)
二、赶超时期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准经济利润”及其社会福利代价	(6)
三、转轨时期赶超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凸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9)
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和自生能力分析范式对经济理论的贡献	(10)
第二节 研究主题：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对人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	(12)
一、假说Ⅰ：发展战略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12)
二、假说Ⅱ：发展战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13)
三、两个假说的推论：发展战略对人均收入的影响	(16)
四、其他竞争性假说：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16)

2 | 目 录

第三节 分析框架与文献背景	(17)
一、改进现有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实证检验框架	(17)
二、改进现有的数据包络分析 (DEA) 方法	(20)
第四节 全书结构	(22)
第二章 一种新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24)
第一节 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分析的参数方法 及其局限性	(27)
第二节 现有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39)
一、某个时点的技术	(40)
二、某个时点的技术效率	(41)
三、生产率变化的测度	(45)
四、技术进步的测度	(48)
五、总产出和人均产出变化的三因素分解	(49)
第三节 现有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严格表述 及其缺陷	(52)
一、某个时点的技术以及技术效率	(52)
二、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变化的测度	(53)
三、产出变化的三因素分解方法	(55)
四、现有方法的缺陷	(56)
第四节 数据包络分析文献的最新进展	(58)
一、最新的文献进展及其暗含的假定	(58)
二、对现有方法的改进：假定各经济体技术前沿 不同的条件下测度技术进步的方法	(63)
三、进一步扩展：各经济体技术前沿不同条件下 测度给定时刻各主体之间技术水平差距的方法	(69)
第五节 小结	(72)